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丛书

B

BU KE CHAO
YUE DE LI
SHI JIE DUAN

不可超越的
历史阶段

杨庆文 姜汉斌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丛书

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

杨庆文 姜汉斌

解放军出版社

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

杨庆文 姜汉斌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工程兵机械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18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065-0826-5/D·89

定 价: 2.6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问题，包括初级阶段理论的探索、提出和依据，初级阶段的不可超越性，它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特征，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初级阶段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等，材料翔实，观点较新，文字洗炼，针对性强，是深化和拓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有益尝试，适合广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阅读。

出 版 说 明

我们向读者推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丛书》，目前在国内尚属第一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轮廓。党的十三大报告将这一“理论轮廓”概括为十二条基本理论观点，据此我们出版了这套丛书，凡十三册：

- 《新的历史性飞跃》
- 《历史大转变的锁钥》
- 《国情与道路》
- 《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
- 《生产力与社会主义》
- 《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
- 《改革·开放·发展》
- 《民主政治·精神文明》
- 《坚持两个基本点》
- 《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
- 《党风与党的生命》
- 《党际关系的新发展》

《和平与发展——当代世界的主题》

这套丛书将陆续付梓，计划1988年内出齐。

这套丛书由本社约请解放军国防大学和总政治部宣传部一些从事理论教学、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的同志撰写而成。作者们力图把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状、思想性和知识性结合起来，尝试使丛书既适合军内外青年阅读，又对专业理论工作者有一定参考价值。

书中不当之处，热忱欢迎读者指正。

解放军出版社

1988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探索的历程	(1)
一、一个世界性新潮流.....	(2)
二、中国的探索.....	(7)
第二章 历史坐标点的确立	(20)
一、特定的历史阶段.....	(20)
二、根源在生产力落后.....	(25)
三、社会主义社会不成熟.....	(45)
四、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53)
第三章 跳不过去的历史阶段	(56)
一、历史根源.....	(56)
二、历史曲折造成的延误.....	(69)
三、迎着“球籍”危机前进.....	(72)
第四章 多元的发展特征	(76)
一、需要把握的几条基本原则.....	(76)
二、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特征.....	(78)
三、初级阶段的政治发展特征.....	(90)
四、初级阶段的文化发展特征.....	(102)
第五章 一条新路线	(110)
一、一条来之不易的新路线.....	(110)
二、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	(115)

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唯一正确的	
前进道路	(120)
四、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不可丢弃的	
优良传统	(139)
第六章 理论新篇	(145)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145)
二、振兴中华的坚实起点	(156)
三、改革伟业的理论基础	(159)
四、统一思想的科学武器	(163)
附 记	(167)

第一章 探索的历程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必然会受到历史条件和历史规律的制约。人们对自己所创造的历史的理解，也不是与自己的实践同步前进的。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预言，从人类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①。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人类历史还没有达到这一步。

中国人民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历史，但是，我们究竟是在怎样的国情基础上、创造着怎样的社会主义，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和只能够创造怎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又应该沿着一条怎样的道路去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对这样的问题，在很长时期里我们并不是十分清醒的。经过总结历史经验和 9 年的重新探索，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一个崭新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地指明：我国社会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历的一个很长历史阶段。这一理论以新的思维阐明了我国国情的本质和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5 月第 1 版，第 3 卷第 323 页。

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这不仅使我们对自己已经创造和正在创造的历史的理解豁然开朗，而且使我们具有了观察和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我们党总结长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的结晶，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再认识的光辉成果；它的提出，既具有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条件，又具有世界社会主义改革潮流的广阔国际背景。

一、一个世界性新潮流

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从那时起，科学社会主义不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它不仅从理论发展到实践，并且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到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帝国主义制造的战争、封锁围困等外部磨难，也经历了国内天灾、人祸和工作失误造成的挫折，仍然屹立在世界上并不断壮大，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发展到当今时代，历史向社会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迅速崛起的新技术革命席卷整个西方世界，影响所及，不仅促进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增长，而且引起了社会结构、产业结构、劳动方式乃至人们的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相对繁荣，发达国家普遍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实施一系列社

会福利措施，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渴望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并没有爆发。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在其发展中却出现了许多挫折和失误。二次大战后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由于照搬了苏联的经验，普遍形成了僵化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民主法制很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这就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怎样吸收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怎样建设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政治民主和精神文明，使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优越性和吸引力充分发挥出来？一句话，怎样建设比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这种挑战说明，社会主义在历史的进程中遇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们始料不及的新课题。这个问题引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人民的深刻思考，成了他们当前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的中心。

把社会主义遇到的挑战乃至危机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种观点在资本主义世界自不待言，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乏其人。但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思考，有了一个大体相同的认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建立乃是各自国家原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因而它比旧社会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生命力；社会主义所以会遇到挑战和危机，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在于它的具体的实现形式即社会体制，即采用了一种与本国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这种体制首先形成

于三十年代斯大林领导之下的苏联，它一方面出于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构想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另一方面又适应了当时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压力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苏联单独建设社会主义，迫切要求经济高速发展、尽快实现工业化的形势。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起到了特殊的历史作用，尽管在农业上收效不大和在工业上资源浪费十分严重，但是它保证了财力、物力、人力高度集中的使用，确实使苏联工业实现了连西方国家也感到惊奇的增长率。成绩的取得和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地位加大了这种体制的国际影响，以致于被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当作社会主义的标准模式照搬过去。随着历史的发展，苏联模式日益显露出其种种弊端：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否定商品经济、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企业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广大干部和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压抑，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不仅如此，这种僵化体制还具有某种超越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超越现实社会发展阶段的空想因素。从50年代以来，包括苏联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时至今日，这种认识是越来越深刻和清晰了。显然，如果不根本改变苏联模式，继续沿着这条老路走下去，社会主义的路子将越走越窄，社会主义的生机将会被窒息。冲破僵化的苏联模式，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挑战，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认识和强烈要求，于是，便形成了勃兴于社会主义各国的

改革潮流。

要想真正找到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改革的路子，就必须认清本国的国情，特别是本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本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程度。这是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要做出符合实际的科学估计，不仅需要理论和政治的勇气，还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实践证明，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进程不同，各自对此的估计也不相同。有的对本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有明确的论断，有的则没有十分明确的论断；有的时而估计高些，时而又估计低些。从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看，在各自反复变化的估计中，呈现出一种明显的降调趋势。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60年代初就认为本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任务，进入了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阶段。在经过1968年布拉格事件之后，捷共中央批评以前宣布进入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提法是把希望当现实、超越发展的主观主义愿望，从70年代到80年代一直强调捷克斯洛伐克是朝着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前进。再如波兰，1975年波兰统一工人党七大曾宣布波兰社会主义基础已经建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大部分任务已实现，进入了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到80年代初期，波党中央改变原先的估计，重新确认波兰社会仍处在长期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主要任务是在一切领域建立社会主义基础，并认定将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结束社会主义基础的建设，那时才进入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保加利亚共产党在1976年十一大时提出到1990年基本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到1987年4月保共十三大时则改变了原来的估计。

明确提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时间将比原先的预计更长的新论断。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则认为，建设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仍处在这一阶段的开始时期。苏联关于本国社会主义发展所处阶段的认识，降调趋势更其明显。我们知道，苏联超越历史阶段的思想是由来已久的，而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大影响。在苏联1936年完成农业集体化不久，斯大林就于1939年党的八大宣布苏联已经走上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和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斯大林逝世之后，赫鲁晓夫从1956年苏共20大开始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肃反扩大化等错误，并于1957年着手经济体制改革，但是赫鲁晓夫在苏联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问题上反而比斯大林更为冒进。赫鲁晓夫在1961年苏共22大提出要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到80年代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勃列日涅夫批评赫鲁晓夫犯了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从而比赫鲁晓夫对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的估计退了一步，认为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的任务是进一步建设好这一社会。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感到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提法仍然过高，干脆修改成处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起点，或入口处。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积极推进苏联的改革，停止使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和“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入口处”等提法，他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处在发展的阶段，要完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这些国家关于本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论断是否正确，我们不好评论，因为只有他们自己对本国的实际情

况最有发言权。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意识到过去超越阶段的思想是错误的，逐渐降低原先对本国社会发展阶段过高的估计，力求做出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论断，这就为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确定出较为接近实际的理论前提，对我们有很大启示。况且，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之中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我国要高，相比之下，我们更应慎重地审视我们自身的超越阶段的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重新做出科学的论断。

二、中国的探索

在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同样是一个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要真正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首要问题是认清中国社会现时所处的历史阶段，因为这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这和搞革命的道理是一样的。中国是落后的东方大国，无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因而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的经验也不行，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我们党经过反复探索，付出了血的代价，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认清了旧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认清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以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是比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更为艰巨

的任务。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转折点，以此为标志把我们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虽然以“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而告终，但也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产生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认识上看，正面的经验是精神财富，反面的经验也是精神财富。

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对国情的判断和由此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从比较谨慎、实事求是，到越来越脱离中国的实际、越来越“左”的发展过程。在建国前后和50年代前半期，我们党对国情的认识和决策是符合我国实际的。建国头3年，我们党把恢复国民经济作为中心任务，同时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确认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历史阶段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并预计用3个5年计划即15年时间完成。但是，后来由于工作进展顺利和某种程度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仅用3年即到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1956年党的八大对国情做出了新的判断：我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建立起来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

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尽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种认识和决策是符合当时国内实际的。但是，随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左”倾思想开始发展，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实现“一天等于20年”的大跃进，急于实现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三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造成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萎缩，商品奇缺，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总结经验教训把困难如实地告诉人民，停止了大跃进的“左”的做法，并且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一系列比较切合实际的方法步骤，三年时间就从困难境况中恢复过来了。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本清除，在政治思想上还有所发展。1962年经济生活刚刚有了转机，又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方针，并从1963年开始在全国掀起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四清”运动。1965年提出，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把全国各级党的领导干部作为打击的主要对象。到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把以前“左”的思想和政策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硬说全国上下都出现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正威胁着党和国家的命运。这就一下子把一个好端的社会主义社会推进了全面内战的深渊，而且一发而